

一、老子的生平

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为春秋末期人，略早于孔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但历来对老子的姓氏、籍贯又有着不同的说法。《史记正义》引《朱韬玉札》和《神仙传》说：“老子，楚国苦县濂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刘向《列仙传》则称老子为陈人。《老子音义》引河上公说：“老子 陈国苦县厉乡人。”又《史记索隐》按：“葛玄曰：‘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 因以为姓’等等。在这里老子的姓氏与籍贯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一、老子究竟为何姓？二、老子的名与字究竟为何，为什么字为‘聃’？三、老子籍贯是楚国还是陈国呢？下面我们就分别对这三个问题作些研讨。

（1）老子的姓氏

按照《史记·老子列传》、《神仙传》、《列仙传》、《朱韬玉札》等记载 老子确是姓李氏，其母姓李，据葛玄说：老子为李氏女所生，故

从母姓。这大概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老子崇尚女性（“崇柔尚雌”）的缘故。至于说老子“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或《史记正义》所引《玄妙内篇》所说：“李母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腋而生”等等，自然是道教的一种神秘主义说法了。然而既然姓李，为什么又不称李子而称老子呢？《史记正义》引张君相说：“老子者是号，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众理，达成圣孳，乃孳生万物，善化济物无遗也。”老子是号并非名，老子是指“考教众理，达成圣孳”的意思。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解释，为一般人所不取。据东汉著名学者郑玄《礼记·曾子问》注说：“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老是指长寿的意思，故相传老子活了 160 岁，或 200 岁，乃至“不知所终”之说。葛玄《道德经序》则有所谓“（老子）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说法，老子幼年即有老人相（皓首），所以称老子。也有的学者认为：“老子，子姓，子之为李，语转而然。”（姚鼐《老子章义序》）但高亨先生对这一说法则不以为然。高亨先生认为老子原姓老，后因音同变为李，老李一声之转，其根据有四：一、孔子墨子皆称姓，而老子不称李子，可见老子原姓老，其证一也；二、古代有老姓而无李姓，春秋 240 年无姓李者，《战国策》始有李悝、李克等李姓，可见李姓出现甚晚。由此可知老聃原姓老，其证二也；三、古人姓氏多无本字，借同音字为之，如荀卿亦作孙卿，田仲亦作陈仲，故老之变为李亦为语转而已，其证三也。四、古韵老、李音近，故可由老而变李，其证四也（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高亨先生这一说法亦有一定道理，可备一说。

（2）老子的名与字

据原《史记·老子列传》称老子“名耳，字聃”，但今本《史记》则作“名耳，字伯阳，谥曰聃”。王念孙《史记杂志》说：“《史记》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阳，谥曰聃。此后人取神仙家书改窜之耳。”王念孙这一说法很可能是有道理的。据

《索隐》按：“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可见《索隐》本《史记》为“名耳，字聃”，并且明确指出“有本字伯阳，非正也”。据此老子原字聃，而不字伯阳，所以王念孙怀疑今本《史记》作“字伯阳，谥曰聃”，是“后人取神仙家书改窜之耳”。确实，《史记正义》所引《朱韬玉札》和《神仙传》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

《史记正义》又说：“聃，耳漫无轮也。《神仙传》云：‘外字聃’。按：字，号也。疑老子耳漫无轮，故世号曰聃。”按这一说法，外字聃即是外号为聃，由于老子耳漫无轮，所以人们给他一个外号叫聃（聃者，耳漫无轮也）。可见聃并不是“谥（不是死后给他的称号）”这是《神仙传》的说法。今本《史记》改字聃为字伯阳，很可能是受《神仙传》的影响所致，并把“外字聃”外号误作为谥号。至于“聃”字，按许慎《说文》说：“聃，耳曼也。”曼有长义。耳曼即为耳长的意思。“名耳字聃，适合名字相因之义。”（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大概正由于耳长大的原故，所以《神仙传》又有“重耳”之名。老聃在《吕氏春秋·不二篇》中亦称作老聃。《说文》：“聃，耳大垂也”。聃与聃义相近，皆指耳长的意思。由此可见，不论“字聃”还是“外字聃”，“名耳”还是“一名重耳”，都是与老子的“耳曼”分不开的。

至于《神仙传》、《列仙传》等，皆称老子“字伯阳”不知所据为何。《索隐》则说：“今作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既然字伯阳非正，那么号伯阳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可能是后人讹传而成。查汉高诱所作《吕氏春秋·重言篇》注说：“老聃学于无为而贵道德。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孔子师之也。”这里显然是把老子误作为周史伯阳父，这是因为老子亦是周史的缘故。所以陈奇猷案：“《国语·周语》上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

王乃灭，周乃更迁。即高氏此注所本。”这就把春秋末年孔子所师的老子，当作成了西周末年的周史官伯阳父了，更有甚者，高诱在注《吕氏春秋·当染篇》中“舜染于许由、伯阳”时说：“伯阳，盖老子也，舜时师之者也。”据此老子不仅是孔子之师，而且是舜的老师，老子确是位长寿不死的人了。这里高诱显然是接受了神仙家的说法了。

（3）老子的籍贯

据《史记》所载，老子为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而《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说苦县属陈国。那么苦县究竟是楚国还是陈国的呢？《索隐》说：“《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据此，苦县本属陈国，春秋末年，公元前 479 年楚惠王灭陈，自此陈地属楚，苦县自然也就成了楚国的领土了。公元前 479 年正是孔子去世的那一年，而孔子曾经师事过老子，老子比孔子年长，以此可知老子出生时，苦县属陈国，因此老子的籍贯应是陈国苦县。可见老子是陈人才是比较确切的。《史记正义》则说：“按年表云淮阳国，（汉）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又说“《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也。’厉音赖。晋太康地记云：‘苦县城东有濂乡祠，老子所生地也。’”按照《正义》所说，西汉初年的封国中有淮阳国，当时苦县属淮阳国，后来汉景帝时废了此国，苦县可能划入了楚国，由此太史公依照当时的情况把苦县归入了楚国。至于厉读作赖，所以厉乡又有濂乡之称。《正义》的这一看法亦可备一说。又边韶《老子铭》和《经典释文叙录》皆称老子为相县人。《老子铭》说：“春秋之后，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相县春秋之后其县荒芜，后才并入苦县的。所以苦县相县其地实一县。一般认为，老子的出生地苦

县赖乡曲仁里，其地则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东。^①

老子的生卒年，由于史料缺乏，已不可详考。我们只知道他的年岁要比孔子大。按照《史记》所说，只知他“见周之衰”而西出关，“莫知其所终”，所以究竟他去了哪里，死于何时已不得而知。《史记》只是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老子是位善于修道养生的人，究竟是否活了 160 岁，还是活了 200 余岁，这已无法加以考定了。至于道教认定老子生于殷时，老君圣诞为殷武丁九年二月十五日，老子是一位长生不死的尊神，这自然是道教界的说法了。以此《史记正义》引“葛仙公序云：‘老子体于自然，生于大始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老子与天地终始，因此难以知道他有多少岁数了。

老子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亦很少。据《史记》说，他曾当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而守藏室之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官呢？《索隐》说：“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守藏室之史，即指执掌搜集保管文献资料和图书的官吏，所以现在有人说老子担任的是周王室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至于说老子为柱下史，按照《索隐》所说，柱下即指藏书室之柱下，老子在藏书室的柱下当官，也就是说老子是藏书室之史的意思。以此藏书室之史与柱下史本是指的同一官职。正由于老子执掌文献图书的工作，所以使得他学问十分渊博，是位精通古代典籍文化的学者。老子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陈国相县出至周都洛邑当官的也已无法考证。

相传老子一生中曾经与孔子有过几次交往，这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位伟大哲人的相会与思想的交流，

^① 马叙伦先生说：“相属陈地，不见春秋经传（《老子校诂》），所谓相者，即汉书地理志沛郡之相”，应属宋国。所以《庄子》中有孔子南之沛见老子之说。老子为宋之相人，而非陈之相人。亦可备一说。

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孔的相会与思想的交流，也就是儒、道两家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所以他们的交往，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记·老子列传》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在这里只是说孔子去过周都洛邑，访问老子，询问过周礼。但孔子什么时候适周见老子的并没有记载。查古代典籍和史书，孔子见老子曾经有这样几种记载——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然而《史记》的这一记载有误。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昭公七年》注中说：“（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二人师事孔丘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后。《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太史公盖误以此年孟僖子（即釐子）卒，不知懿子及敬叔生于昭十一年，……。即昭二十四年，二人亦年仅十三耳。”又杜预注说：“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如果懿子与敬叔确是在釐子卒后师事孔子的话，那么敬叔“请与孔子适周”，“见老子”当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后。昭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 518 年，其年孔子已 34 岁多了（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按照这一说法，孔子自周返鲁已经有了不少弟子。由此可见，孔子适周不可能是十七、八岁的人，很可能是 30 多岁时适周问礼于老子的。

《庄子·天运篇》则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问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这一段文字出之于道家《庄子》，带有明显的尊老抑孔的思想。孔子自述“三十

而立”，不可能“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问道”，以此孔子“五十有一而不问道”，这显然是道家贬抑孔子的说法。至于“孔子行年五十有一”，“乃南之沛，见老聃”的说法，这与《史记》所说“适周，问礼于老子”则不一样。这里有时间不一样与地点不一样两个区别。一是在孔子 30 多岁，一是在孔子 51 岁；一是西适周（周都洛邑），一是南之沛（沛，现江苏沛县）。这显然是不同的两次，孔子 51 岁时，老子已经是一位去官之后的老人了。可见此时老子离开了周都来到了沛地，孔子由此南之沛见老子的。可能也有人会提出疑问，《庄子》寓言十之八、九，孔子南之沛见老子是道家编造出来的，不可相信。但道家编造也可能有所本，并不全是虚构的。

又《庄子·天道篇》说：“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这里似乎孔子又有一次见了老子，目的是为了请老子帮忙（“因”这里指请老子帮忙、介绍）藏书于周王室，但老子拒绝了孔子的请求。这大概是老子既然已经引退在家（“免而归居”），也就不想再与周室打交道的缘故。这里讲的“免而归居”，看来老子已经回到了老家陈国相县。而《天运篇》所说的老子在沛地见孔子，大概也是在老子“免而归居”之后的事。至于《礼记·曾子问》中所说：“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垆（垆，道也），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孔子所谈的这一段往事，大概是在孔子 30 多岁时适周问礼于老子的时候。当时孔子对礼义制度尚不完全熟悉，而老子是位史官，是位深晓周礼的专家。在宗法制度的社会中，孝是礼的根本，而孝礼中葬礼尤为重要，所以孔子曾经师事老子助葬于巷党，学习过葬礼。关于老子深晓葬礼的事，在现存的《老子》一书中就有反映。《老子》三十一章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

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可见，老子确是对丧礼有很深的研究，亦可知丧礼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由此亦可推知，孔子向老子问礼，其中必定包括有丧礼葬礼，而《礼记·曾子问》中孔子跟从老子助葬于巷党的记载，想必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但“巷党”究竟是何地，现已不可考。有人说“巷党”之前不冠以国名，又《论语·子罕》有“达巷党人曰”句，巷党很可能是在鲁国。如果按照这一说法的话，那么老子曾经到过鲁国，孔子是在自己的国家之内“从老子而助葬”的。这显然是一种猜测，不知确否。然而孔子助葬时正遇日食，日食的年月是可根据史书记载而得知的。高亨先生《史记·老子传笺证》引阎若璩《四书释地续》曰：“《曾子问》：‘孔子曰 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 及桓 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见《春秋》。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按此年孔子年 34 岁。高亨先生又引梁玉绳话说：“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时，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门从师，且生才 14 岁，恐亦未能见于君，未能至周。”这里说僖子方卒（二月卒），五月日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朱光鑫《历代日食考》说公元 518 年 4 月 9 日日环食，起于西北利亚西部，略偏东，即向西北而入北冰洋，鲁都不能见），又此日食鲁都不得见，自然也包括中国中原地区不得见。由此推知，孔子助葬所遇之日食，并不是昭公二十四年之日食。另查《春秋》昭公三十一年记载说：“十有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杨伯峻注：“此为公元前 511 年 11 月 14 日之日全蚀。”其时孔子 41 岁 离开僖子去世已七八年之久，敬叔已成人，孔子与敬叔一起适周问礼，助葬遇日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从敬叔服丧三年之后即与孔子适周，那么孔子最早适周应在他 37 岁之后，而助葬遇日食已是孔子师事老子多年之后的事了。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孔子见到老子并不只有一次，至少应有三次：一是 30 多岁时孔子与敬叔一起适周问礼于老子

(可能包括助葬之事)。二是老子“免而归居”之后，孔子欲西藏书于周室而往见老子，地点在老子老家相县。三是孔子南之沛见老子，这是在孔子 51 岁之时，也是在老子引退后出游沛地时。

在孔子与老子的交往中，除了老子向孔子传授礼仪之外，老子还告诫孔子说：你所说的道理，早已过时了。君子得其时可以出来做官，不得其时则应隐居起来，随着时风而转移。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善做生意的人，深藏宝货能不令人见；智慧超人的君子，外貌就像愚笨的人一样。因此你应当去掉骄气和奢望，这些东西对于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好处。^①孔子离别老子之后，回来对自己的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用“网”捕兽），游者可以为纶（“纶”即钓丝钓鱼），飞者可以为矰（用“矰”即用短箭射鸟），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十分尊崇老子，称赞老子就像是一条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而不是一般的鱼鸟走兽。关于孔子称老子为龙的说法，在《庄子·天运篇》中也有记载。《天运》说：“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规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章指文采），乘云气而养（即翔）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言（言，合也），予又何规（规谏）老聃哉！’”这是说，孔子见到老子，回来后三天不说话，孔子弟子问道：先生见了老聃，对他有何规谏呢？孔子回答说：我见到龙（指老子）了呀！龙身合起来成一体，散开来成文采，乘云气而翱翔于阴阳气之间，我

《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曰：‘子（指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恣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张着嘴不能合拢，我有什么去规谏老聃呢？《庄子·天运》与《史记·老子列传》皆记载着孔子称赞老子为龙的事，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史记》是抄《庄子》而来的。不过《史记》所记载的这件事是放在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之下的，而《庄子·天运》则把它记在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见老子之后，讨论的是有关仁义的事，可见这是两次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谈话，并不是《史记》抄袭《庄子·天运》而来。又有些学者认为《史记》中所说的“去掉你（孔子）的骄气和奢望”之语（“去子之骄气与多欲”，云云）是抄自《庄子·外物篇》的。《外物》说：“老莱子的弟子出去打柴，遇见孔丘，回来告诉老师说：‘有这样一个人，上身长而下身短，背曲而耳向后贴，眼光四射有神气，不知道这是谁家的人。’老莱子说：‘那肯定是孔丘，召他来。’孔丘来后，老莱子对他说：‘孔丘呀！去掉你行为的骄态和外貌上的聪明，你就可以为君子了。’”^①这讲的是一段老莱子告诫孔子的话，有些学者把老莱子当作即是老聃，这是不正确的。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交代得很清楚，老莱子是另一位道家的人物。《史记》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老莱子亦为楚国人，亦言道家之意，与孔子同时，但非老聃。对此高亨先生有详细的考证。高先生说：“（张守节）《正义》：‘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亨按：张说非也。《仲尼弟子列传》序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据此史迁本以老聃老莱子为二人，此处非又疑其为一人，决矣。其证一。史迁云：‘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云：‘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汉世老聃老莱之书具在，故史迁明

《庄子·外物》：“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趋下，末僂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汝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

确言之，则史迁非疑其为一人，又决矣。其证二。此处书之，只是附见之耳，与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公孙龙、墨翟等附见於《孟子荀卿列传》同意，张谓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误矣。又冠以或曰二字者，盖老莱是否楚人，是否与孔子同时，史公所不能详，故据传述者之辞书之。《孟子荀卿传》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正同一笔法也。”（《史记·老子列传笺证》）由此足见老聃老莱子分明是两人，司马迁并未怀疑老莱子即为老聃。《庄子·外物》所记的老莱子，虽说是道家中人物，与孔子同时，但并不就是老聃。正由于老莱子是位道家人物，思想与老聃相仿，所以他告诫孔子要“去汝躬矜与汝容知”，基本上与老聃的“去子之骄气与多欲”，“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教诲相一致了。

老子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著了《道德经》一书。它在历史上对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在发射出智慧的光芒。《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在这里《史记》谈了三件事：一是老子的学术思想，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无为为务。二是老子见周王室已衰颓，乃西出关自隐而去。那么这里所说的“出关”，究竟是指何关呢？《史记·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史记正义》则说：“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或以为函谷关。”可见，历史上向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函谷关，一说为散关。据《括地志》说：“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散关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函谷关即今河南灵宝东北之函谷关。按照高亨先生考证，当时所谓的出关入关一

般皆指的是出入秦国的函谷关。高氏说：“再以《史记》证之，《秦始皇本纪》：‘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又引《项羽本纪》：“今能入关破秦”，《高祖本纪》：“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以此高先生说：“诸关字亦皆谓函谷关也。然则此关为函谷关明矣。”（《史记·老子传笺证》）根据《史记》记载来看，老子西出关，应是指入西秦的函谷关。

至于关令尹喜究竟是何许人？历来亦有多种说法：一说即是《庄子·天下篇》和《吕氏春秋·审己篇》所说的关尹，似姓关名尹，或号关尹名喜。一说关令为关吏，或以关令尹为关吏，名为喜。一说《史记》原本应无“令”字，关尹为姓名，“喜”为喜悦而言。究竟关令尹喜为谁，亦很难确定。先秦典籍《庄子》、《吕氏春秋》既皆有“关尹”之说，又《汉书·艺文志》有“关尹子九篇”著录，班固自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刘向《别录》则说：“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或曰关令子。”以此看来，汉代人 是把喜当作名的。关尹可能是姓关字尹名喜的。按照《列仙传》的说法，关令尹喜为周大夫，后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而“莫知其所终”的。当时老子在关令尹喜的请求下，著了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即为留传至今的《道德经》，亦称作《老子》，为后人留下了一大宝贵的精神财富。

老子究竟活了多少岁，现已无法推知。《史记》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盖者，或然之辞，世不能确知，所以说“盖”。这是说，老子相传他可能活了 160 岁，或 200 余岁。这是因为他能修道养寿的原故。为什么说老子活了 160 岁或 200 余岁呢？这大概是与下面的一个传说有关的。《史记·老子列传》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这是说，孔子死

后的 129 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讲了一段周秦离合之事，有人认为这位周太史儋即是老子，也有人认为不是老子，当时人就已经无法断定了。按照周本纪所说，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又秦本纪说：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查六国年表，周烈王二年正是秦献公十一年，当为公元前 374 年，离孔子去世实 105 年。可见《史记·老子列传》所记“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在时间上有误。如果说周太史儋即为老聃，那么老子就可能活了 160 岁或 200 岁了。但这样长寿是不大可能的事，又老子已于春秋末年西去隐居而“莫知其所终”，那么也就不可能又于战国中期再度出山任周太史。因此这只能是一种传说而已。

又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的家谱世系是：“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这一家谱记得十分清楚。老子的儿子李宗为魏将，封于段干。李宗之子为李注，注之子为李宫，宫的玄孙（重孙）为李假，李假仕于汉文帝，假之子解则为胶西王卬太傅。按照这一谱系推算，以每代相隔 30 年计，则老子的第七代已是汉文帝时人（这七代包括老子、老子之子宗、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宫之子、宫之孙、宫之重孙李假）。汉文帝在位在公元前 179 年至前 157 年。如向前推算七代共计 210 年的话，那么应推至公元前 389——前 367 年。以此看来，老子应是战国中期人，或应活到战国中期。很可能由于有这一谱系的原故，当时有些人就把周太史儋当作为老子了。这是因为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公元前 374 年，这个时间正与老子家谱所推算的老子年代大抵相合。然而《史记·老子列传》所记的这一家谱究竟根据是何，是否确实，我们已不得而知。因此我们也就很难根据这一家谱来断定老子的年代。我们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老子是春秋末年人，主要活动于春秋末年，比孔子要早，但他究竟活了多少岁已不可详考。

二、老子的著作

《老子》一书，亦称为《道德经》。其书原先亦并不称经，只称为道德两篇，或上下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司马迁在这里只称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并不称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现今所见的最古本，有甲、乙两种抄本。帛书乙本上篇尾题为《德》，下篇尾题为《道》，甲本则无。可见帛书乙本亦只称《德》篇和《道》篇，尚不称经。汉初黄老学盛行，学习《老子》的人不少。史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也只是说读《老子》，而不称《道德经》。不过《汉书·艺文志》已著录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这说明《老子》在前汉时已经有称“经”的。据《法苑珠林》六十八引《吴书》说：阚泽对孙权说：“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

始立道学，勒令朝野悉讽诵之。”按此说则景帝时《老子》开始称经。总之，《道德经》的题名是后人所加，并不是《老子》的原名。

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了解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环境。分析老子的思想，也必须把《老子》这本书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因此考察《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成为学术界一向十分重视的问题。

《老子》一书写成于何年代？《老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学术界曾经有着这样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成书于春秋末年，早于孔子的《论语》。如胡适、马叙伦、高亨先生皆持此说。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如冯友兰、罗根泽等先生主张此说。冯友兰先生认为《老子》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罗根泽先生认为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末年，晚于庄子，如梁启超、钱穆等先生持此说。《老子》晚于《庄子》缺乏充分根据，此说似难成立。因此在当前学术界里很少有人认同。然前两种意见似乎各有自己的理由，因此目前纷争正烈。与此两种意见相应，对于《老子》一书的作者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春秋末年的老子自作，一种意见认为是战国中期的隐者所作。罗根泽则认为《老子》一书的作者即是周太史儋。郭沫若先生认为《老子》是老聃学说的记录，而写成于战国时期，并认为《史记·孟荀列传》所说“环渊著上下篇，”就是《老子》上下篇云云。所有这些说法，必须通过充分的自由的学术讨论，才能最后取得一致的看法。

在《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上，我原本主张成书于墨子之后，或与墨子晚年同时的战国中前期说的（参见拙著《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但经过这几年的思考和研究，感到还是主张春秋末年老子所作的理由较充实。时下我的看法是：

《老子》为春秋末年的老子所作，反映了老子的思想。同时《老子》又为战国中前期人所增补，某些方面和思想又带有了战国中前期时代的思想痕迹。

从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可以看到《老子》一书，成书较早，反映了春秋末年老子的基本思想。这些史料是：

(1) 《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这里的老、孔、墨显然是按照时间的前后顺序讲的。而老子贵柔正是《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柔弱胜刚强”）。

(2) 《吕氏春秋·贵公》说：“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孔子讲公，公于人，人遗之人得之，所以说可以去掉荆人之荆。老子讲公，公于天地，天地生育万物不以为己有，所以说可以去掉人。老子讲至公，讲道生养万物，能“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在这里《吕氏春秋·贵公》所记载的老子思想，正好是符合《老子》一书的思想的。《吕氏春秋·当染》说：“孔子学于老聃”。可见老子要早于孔子，反映老子思想的《老子》一书，想必成书亦较早。

(3) 按照《太平御览》卷 322 辑《墨子》佚文中有引用老子“道冲而用之有弗盈”的文句，亦可证《老子》成书较早，最少要早于墨子。墨子能引用老子的文句，这说明《老子》一书已经在社会上有了相当的影响，足见《老子》成书较早。

(4) 《老子》一书在战国中期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当时的主要思想家都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如申不害、慎到、田骈、庄子、管子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老子思想，甚至在日常的交往中一些政治家们都引用

《老子》的话，阐说老子的思想。如《战国策·齐策》记载了颜斄与齐宣王对话时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可见战国中期老子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此亦可说明《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不会太晚。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记载来看，把《老子》成书年代推至春秋末年孔子之前为好。如果把《老子》一书当作战国中期的作品在时代上似乎晚了一些。

《老子》的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来写作的，如《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又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也。”“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为奇者，吾将得而杀之，夫孰敢矣”等等。所有这些文句皆是以第一人称语言讲的。就这点而言，《老子》一书很可能是老子自著，并不是其弟子所作。

但《老子》一书中又似乎杂有战国时期的一些东西。如：

(1) 《老子》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尚贤”的政治，认为只有“不尚贤”才能“使民不争”。我们知道，把“尚贤”政治明确地提出来的应是墨翟。墨子约生于公元前 475 年，约卒于公元前 395 年。一般地说，一个人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总要在 30 或 40 岁左右（“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因此墨子提出“尚贤”的政治，也总要在公元前 445 年至公元前 435 年左右时期。因此，《老子》一书反对“尚贤”的思想很可能是战国前期的人增补进去的。当然在春秋时期也已经有了“举贤”的思想，如孔子《论语》中即有举贤才的思想：“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因此《老子》一书中反对尚贤也可能是针对春秋时期的举贤思想的，但明确提出“尚